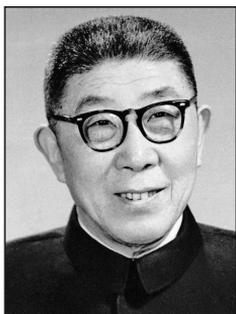




我所经历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王大纯（1935入学，地学）



王大纯学长

王大纯（1915—2007），河北丰润人。1935年从天津南开中学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作为纠察队员参加两次大规模游行。1937年随校南迁至湖南长沙，后辍学参加抗日活动，并前往延安参加革命工作。1941年到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复学，于1943年毕业。毕业后先后任职于云南盐务局和联大，1946年到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参加西藏科考队，历时两年半，行程一万多公里，完成了中国地质学家首次对西藏地区地质资源与矿产分布的考察。1953年底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是我国水文地质和工程地质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水文地质学科的奠基人。

本文是王大纯学长1998年所写，他从一个亲历者的角度记述了“一二·九”运动的发生和发展，特别是还原了一些生动的细节、场景，对我们后人了解运动的全貌无疑是极好的史料。经王大纯子女推荐，特刊登此文，以飨校友读者。

1935年12月，在北平首先发生，随后在全国多个城市爆发了大规模学生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这就是“一二·九”运动。这场运动起自北平的几所大学，后来中学生，甚至一些市民也加入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是民众对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对日政策的不满。随着时间延续，不满逐渐蓄积，最终大爆发。

我是1935年秋天考入清华大学的。前几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期间，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之后的几年中，国民党政府又先后与日军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日本人当时在天津是有租借地的，就在现在的和平区海河右岸，占了很大的一块地方，且经营了三十多年。从南开中学走过去不过十几分钟就是日本租借地，中间仅隔着南门外大街。离开南开中学不远处有一座很老的寺庙，叫海光寺。日军把这里搞成了驻军司令部，日军的军车、坦克在大街上自由通行。在天津还出现过日本人把中国人杀死、丢进海河的严重事件。正在南开中学上学的我见到这些，心里感到很窝囊、很憋气。

当年在南开中学，有一个老师叫张锋伯，那时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成立了一个叫做“青年会社”的组织，人数不多，宣传反蒋抗日，反对汉奸卖国，我也加入其中。在1938年时，也是这位张先生通过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把我们曾经在“青年会社”里的几个同学送去了延安，进入

抗大的。

到了1935年的下半年，日本人对华北的胃口变得更大了，还要成立以汉奸殷汝耕为首的傀儡政权，也就是所谓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名义上是脱离国民政府，实际上是把河北省东北部交给了日本人。国民党政府一再退让，使日本鬼子勾结汉奸在华北搞“自治独立”的活动更是变本加厉，企图通过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特殊化，进一步扩大侵占我国的领土。国民党实行“绥靖政策”，在日本人的威逼下，准备在北平成立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是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退让政策的妥协产物，是日寇推动实现华北自治的阴谋步骤。一旦“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将使得我国华北大部地区不保，中华民族危矣！

对日寇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软弱无能，学生们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当时北平的各个学校中便有学生活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反对华北自治，反对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对日政策。学生们保全国土、抗日救亡的热情很高，着手准备集会，声援绥远抗战。后来才知道这些人中间有些是地下党员。

为什么选择1935年的12月9日举行大规模集会呢？原因是当时有消息传来，说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将在12月9日成立，所以就选定了这一天举行游行示威，这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由来。

“一二·九”运动提出“支援绥远抗战”“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2月9日当天，原来是计划清华和燕京两所学校的队伍进城，与城里的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

东北大学等学校的队伍汇合在一起，在天安门召开大会，然后到新华门向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清华大学的学生队伍人数不少，沿途还有人加入其中，队伍一路向西直门走过去，准备进城。

由于当局事先有所防备，将西直门关闭，死守城门不开。于是学生队伍变为游行队伍，又转向了西便门。

我因身强体壮，又是清华足球队和田径队的队员，被选为纠察队员，负责游行队伍的保卫。在我们游行时，警察总想要抓人，但当游行队伍行进在街道上时，警察又畏惧于学生人多势众，不敢下手。他们通常选在路口、胡同口埋伏，等到游行队伍路过，看准走在后面的老师同学实施抓捕。而我们这些纠察队员也特别要在队伍经过胡同口时加强护卫，保护在游行队伍两侧。我们用几辆自行车横排起来，堵住胡同口和路口，迫使警察无法冲出来抓人。纠察队员多骑自行车，且身高马大聚集在一起，警察们也不敢靠近，只是手里



“一二·九”运动中，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队伍齐集西直门

□ 回忆录

握着长竹竿远远地望着我们，等着大队人马过后再找机会下手抓人。

我们做纠察队员的危险会出现在游行队伍通过后，纠察队员从胡同口撤离时，警察也明白，这种时候是抓捕落单的纠察队员的最佳时机。我就曾经在作为殿后人员最后一个撤离时被一名警察用竹竿挡了下来。幸而跟前地上有一块石头，我顺手拾起砸了过去，击中了那名警察。趁着警察被石头击中时，我推着自行车猛跑几步，跳上车扬长而去。

游行队伍一路上受到重重阻挠，终于来到西便门，可西便门也是大门紧闭。原本计划城里城外的学生们会合的目标没能实现，这也是个遗憾。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到底还是阻止了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这次游行示威活动还有第二次，也就是一个星期之后的12月16日。这一次规模更大，几乎全北平市的大中学生都出动了，不时出现警察与示威学生之间的冲突。警察的镇压明显升级，警察的武器也不仅是警棍和长竹竿了，有些警察手持大

刀，甚至还动用了水龙。当局的这种镇压行为使学生们更加愤怒，冲突也更加剧烈。城里学校的学生中有不少人受伤或被捕。

地处城外的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依旧计划进城。12月16日这一天，清华大学的学生来到西便门，对紧锁的城门进行冲击，试图破门进城。攻打城门的时候，我们纠察队要负责在外围保护，把警察隔在游行人群之外，这样来防止师生们被抓捕。

警察应付我们攻打城门的办法还是死死关住城门，任凭怎样也不开门。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办法。最终，警察还是阻止了我们入城与城内游行队伍的汇合。不过，也正是因为两次游行示威，我们城外的队伍都没能进城与城内队伍汇合，只能在城外示威，所以也没有人被捕。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两次大游行后学生们宣布罢课。罢课初起的几天还是比较平静的，我在这几天里加紧利用“青年会社”的关系与仍在南开中学的同学取得联系，通告北平方面的情况。得知他们已经和南开大学、北洋大学、汇文中学等联合起来准备起事。

这种平静的日子不过几天而已。大约一周后的一天早晨，还不到六点钟，我和同屋同学们正在宿舍睡觉，警察突然推门进来，喊叫着让我们把学生证拿出来，他们要一一核对，搞得楼里乱哄哄的。于是，我们陆续起床，洗漱之后就要去吃早饭。这时却发现，每个楼门口都有警察把守着不让我们出去。由于警察是挨着宿舍一间间搜查，速度很慢，时间一久聚集在楼道和门口的人越来越多，学生与警察对峙着，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终于，愤怒的学生们忍不住了，不知是什么人喊了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清华足球队队员王大纯

一声，大家就一同用力冲出了楼门，警察也是束手无策。

冲出宿舍楼后我们很快发现有同学被捕了，正在押往西校门。于是大家赶紧兵分两路，一部分人继续与正在楼里搜查的警察周旋，把他们就地缠住，另一部分同学马上到西校门去救人。

我们跑到西校门时，看到有两三辆汽车和一些被捕的同学，于是大家一拥而上，合力推翻了这几辆车，并且点火烧了起来，还把被抓的人都抢了回来。警察看到这个阵势，也不敢阻拦，更无心继续抓人，都吓得逃跑了。警察的这次搜捕以失败而告终。

有了这一次的教训，我们的警惕性也提高了，想了各种防护的办法。为保证罢课的胜利和学生的安全，严防军警特务像上次那样的偷袭，在校学生加强了警戒。还以游行示威时的纠察队为基础组织起来，分成了几个组。有负责把守校门的；有负责扩大警戒范围，到海淀和成府一带巡视的；还有负责和燕京大学学生会取得联系，互通情报的。除此之外又作出规定，校内如发生情况，就不规律地敲响工字厅后面的大钟。这是一口很大的钟，敲击时声震全校，本是用作报时，白天每小时敲一次。现在要把这口钟当作警报用，大家听到钟声就立刻去礼堂集合。

我作为游行示威时的纠察队员，和一些同学轮流把守着校门。过了几天，已经是12月31日了，轮到我和三四名同学在校门口当值守卫。大约傍晚五时左右，有一个负责外联的同学骑着自行车急匆匆赶了回来。他说经过和燕京大学学生会联系，了解到有情况，估计驻扎在西苑的军队可能要开过来，进入清华大学进行搜查。我



清华大学游行队伍攻打西便门

们因为要继续把守校门，就让他立刻回去报告。不一会儿，工字厅后的大钟敲响了！我们也接到通知，让大家赶紧去吃饭，然后到礼堂开会。晚上七点钟左右，又有消息传来，军队已经开出西苑兵营，向着清华大学这边开过来。

大家并不清楚这次军队开过来是要做什么，但预防准备工作还是要做好。经过研究，为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把人抓走，决定大家集中在一起躲起来。学校里能容纳这么多人的地方只有两处，一处是礼堂，另一处是体育馆。礼堂正对着学校大门，很容易被发现，不易隐蔽，于是决定大家都躲到体育馆去。体育馆里很宽敞，可以并排布置三个篮球场，足以容纳全体同学。

待大家进入体育馆后，立即派人拉掉了全校的总电闸，整个校园即陷入一片黑暗。这么大的清华园，房屋又多，除了教学用的房屋，宿舍楼就有五座，男生楼四座，女生楼一座。不熟悉的人在黑暗中乱找，真像大海捞针，不知到哪里去找人。

□ 回忆录

军队和警察进入学校后，只能摸索搜查。当时还有意在宿舍中留下少数同学，他们故意跑到宿舍的四层楼顶上大声说话。军警们听到说话声，小心翼翼摸索着爬到楼上，一看却没有几个人，一查还都是学生。问学生们其他人在哪里，也是一问三不知。军警们一无所获，这几个同学也安然无事。

我和同学们都悄悄地坐在体育馆里，好几次听到外面有人说着话走过去。大家在里面虽然挺紧张，但都屏息不动。如此在黑暗中捉迷藏，至少经过了五六个小时，后来军警们才想到应该开灯，又费尽周折找到总电闸开了灯。

体育馆直接通外面有两个门，分别在南北两侧。不知哪一个家伙先摸了进来，一开灯发现馆内地板上坐满了人。只听他一声大叫：“全在这里呐！”顿时，体育馆外叫喊声、跑步声响成一片。一个团的士兵警察以及便衣特务随即全集中到了这里。军警特务们冲进体育馆，士兵们持枪对着手无寸铁的我们，枪栓拉得“哗啦哗啦”作响，警察、特务气势汹汹地叫嚷着。事发突然，同学们先是一阵大乱，但很快又静下来。大家站了起来挤作一团。为了不让同学被抓走，我们紧紧挤在一起，互相挽起臂膀。警察抓不出人，与学生纠缠在一起，僵持着。后来士兵又上前抓人，到底是士兵比警察有力气，他们采取两个士兵架住一个学生的办法，生拖硬拉地拽起人来，然后再架到门口挨个问姓名，并拿着学生名录，一个一个地盘问核对。姓名与名录对得上便放掉，看来这次军警特务们抓人是有目标的。

被架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多，排成一队，队伍从体育馆门口一直排到馆中间。

不久，我也被拖着架出来。排队到了门口时，有三四个特务在翻学生名录。问我姓名，我说了，可他们翻了半天竟然没找到。又来问我一遍姓名，才总算在名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这样，我也被放了出来。此时已是1936年元旦凌晨四时左右，可完成核对的同学还只有三分之一。

时间越拖越久，据后面出来的同学说，最后是军队的那个团长等不急，对警察发了火。士兵们也不管架人了，只剩下几个警察和便衣特务进行查对，更是进展缓慢。后来才知道，这些士兵是驻西苑的二十九军的一个团，该团原定元旦上午九点钟去参加阅兵，他们应该七点钟回营房开饭。假如按当下的速度挨个检查，不但赶不上开饭，恐怕连检阅也无法参加，所以团长匆匆集合士兵撤离了清华园。军队一撤，警察、特务顿时慌了神，他们不敢久留，只好把体育馆里面还没有核查的人也全放了。

警察们灰溜溜地走了，大家都出来了，也没有人遭到逮捕，紧张之余的轻松让人感到很快活。这一次反抓捕的成功，在于提前得到情报，事先有所组织，有了充分的准备。这样使我们再次粉碎了敌人的突袭与抓捕。此外，同学们坚定地相信我们的抗日爱国行动没有错，这种勇气使大家团结一致，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在对付军警们的过程中也没有给对方以任何在校园内抓人的口实和机会。既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又没有造成任何损失。

“一二·九”抗日救亡爱国运动已经过去60多年了，很多细节也随着时间而变得模糊起来，这里仅仅记录下我在清华大学亲身参与和经历的一些片断。